

美出口倍增计划时运不济难成功

陈东海

2010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未来五年将美国的出口增加一倍的所谓“出口倍增计划”。虽然美国2010年上半年的出口比2009年上半年增长约20%,但是这种快速增长是建立在2009年全球深陷经济危机而导致的国际贸易萎缩的基础上的。实际上,2010年上半年美国的出口还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前2008年同期的水平。

奥巴马的倍增计划,是为了扩大美国产品的市场,提升美国的就业率。但是即使是美国未来五年真的出口能够增长一倍,如果进口增长更快,那么美国的企业和产品实际在总体上还是处于失去市场的境地,美国的就业率还是会持续受压。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成为可能。在美国的出口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同期水平的时候,美国的贸易赤字则以更快的速度接近金融危机前2008年的水平。

出口倍增计划的真实意图是,逐步缩小逆差甚至出现贸易顺差,为美国的就业率提升创造空间。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局面不可能出现。

美国出口要在未来五年增加一倍,从

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注定是一个泡影。美国要解决失业问题,练好自己的内功才是正道。比较可行的是,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增加自己制造业的竞争力,即实行再工业化。

贸易结构上来说,只有美国的产品具有开拓疆土的竞争力才行。但是由于美国的劳工力量成为第一强势的力量,其工资和福利过于丰厚,所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非常高昂,美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丧失了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美国企业、劳动者、产品已经无法与全球新兴经济体低廉的环境成本、人工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进行竞争,正在逐渐丧失领地败下阵来。奥巴马总统于2010年8月11日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希望通过暂时取消或削减美国制造业在进口原材料过程中需付的关税,来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并恢复在过去10年中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但是该法案的规模仅170亿美元左右,白宫预计,未来三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将因此增加46亿美元,创造支持就业岗位9万个。即使这个法案达到成效,也仅仅是杯水车薪。既然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而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对于如何取得竞争优势几乎毫无见识和创建,如何能

指望美国的出口在未来五年里倍增?

在美国的制造业和产品结构里,惟有部分高科技产品具有优势,这些产品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军工领域里。靠出口高科技产品即军火生意来达到出口翻番的目标,则更显得不可行。目前美国每月的出口大致在1000亿美元左右,如果要翻番,则每月的武器出口要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才行。但是武器产品与日用产品不一样,是一种非常长时期的耐用产品,消耗较少,一次购买的东西可以在许多年里使用,不会无限制的重复购买。根据俄通社发布的报告,2008年全球的武器交易额才1013.14亿美元,全球哪里容得下每月1000亿美元的武器出口?大量出口还会导致武器扩散的风险,威胁到人类的和平甚至生存。再说,出口高科技武器,学习效应很强,进口方会尽力模仿,最终使得出口不可持续。因此,靠高科技出口是根本就达不到出口翻番的目的的。

如果要在出口价格和汇率上打主意,也会是竹篮打水。目前美元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美国实在是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够主宰美元的走势。何况目前国际外汇市场每日交易额达到4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一年的GDP总量,主要的交易币种是美元。要想干预汇率,并且让美元的走势按照自己干预的方向去走,不是一个、二个月的事情,由于外汇市场一周的

交易量就远远超过美国一年的GDP总量,即使如美国也无法长期的、有效的干预外汇市场。并且为出口而干预汇率,是以邻为壑之举,必遭世界的反对。因此,想靠美元贬值来增加美国的出口,根本就不现实,而且美元从长期趋势来看,早已创下了历史大底,未来的趋势是走强。

这个计划的外部环境也不理想。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第一引擎。二战以后,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拉动了欧洲的全面复兴。上个世纪60年代,拉动了日本的起飞。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美国又成功地让亚洲四国和地区成为“小龙”。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市场让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现在美国要想出口倍增,让全球其他经济体来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不符合历史惯性。何况现在各国或多或少都奉行重商主义,在后危机时期,都是企图用出口来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全球没有接纳美国出口倍增的市场。现在各国正在忍受危机苦果,适度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没有美国出口倍增的空间。

因此,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注定是一个泡影。美国要解决失业问题,练好自己的内功才是正道。比较可行的是,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增加自己制造业的竞争力,即实行再工业化,用美国自己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来取代进口,逐渐缩小贸易逆差,这才是有可能成功的举措。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

关于房价的套套儿逻辑

黄小鹏



对于今天中国的房价,大概除了任志强,几乎都认为太高了。但是,如果要问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答案恐怕就没有那么一边倒了。尽管神州各地的房价短短几年内普遍涨了好几倍,绝对价位居高不下,但媒体上关于泡沫的争论仍未完全平息。

无泡沫论者大多从城市化潜力、刚需强劲、富人购买力强等日常所见现象出发,得出虽然房价收入比高、租售比低但市场无泡沫的结论。这些直白的证据,让他们的结论看上去很有说服力。特别是今年4月中旬推出新国十条,断绝了第三套房贷之后,房价仍然十分坚挺,越来越多的全款购房现象被报道,这使刚需说、富人说显得更加有理。但是,细究这一派的论证逻辑,我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先从富人购买力说起。

穷和富是一个相对概念,贫富差距大意味着大量财富集中在在占总人数很小比例的那些人手中。在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甚至白领的中上层都觉得难以承受房价之高时,那些为数很小的一部分真正富人可以轻松全额地买入多套住房,似乎可以说明,房价高得很有道理,高得一点泡沫也没有,因为确实有人有这个购买力。既然有真实购买力,那么就谈不上泡沫。穷人觉得贵,只能怪自己实力不够。

但俗话说再富再贵也不过是一日三餐、晚上睡一张床。富人钱多,但肚皮不一定比普通人大,消费起粮食来,多不到哪几去。同样,富人可以住比穷人大得多的房子,也可以轻松买得起几套、几十套房,但富人并没有孙悟空那种吹一下毫毛就变出一群猴子的本领,其消费所需不会超过一两套。就算是某个人钱多得慌,在全国每个城市都置备一套别墅以度假度假,一定是出于正常消费之外的动机,因为要得到同等享受有成本更低的方式,除非这个人是笨蛋。显然,单凭一小撮富人的真实消费需求,显然不足以影响市场格局。

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人的收入可能被低估了,如果加上大量的灰色收入,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可能没有数字显示得那么高。经济学家估算出来的灰色收入高达数以万亿计,我们姑且认为数据切合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收入大多集中在上述比例很小的那些富人手里,如果人人有份,那大家的真实收入就远比统计的要高了,普通人房价收入比就是被高估了(对于富人房价收入比没有意义),换言之,大家就不会承受不了现行房价。“房价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等价于“房价收入比过高”,“房价收入比过高”等价于泡沫。如果沿着这个逻辑链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富人、灰色收入难以成为否定泡沫的理由。

那么,全额付款的有钱人和向银行借款的伪有钱人为何大量购入超过自身真实消费的住房呢?大多数人还记得1988年市场大抢购的情况吧。当时人们不计代价,疯狂买入食盐、火柴、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其实1988年日出日落照常,人们吃喝拉撒也一如以往,与此前的1987年和此后的1989年相比,对火柴肥皂的真实消费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火柴肥皂的生产亦如是。大抢购原因简单而清楚,不过,那时候市场经济虽然不如现在发达,但当

时的经济学家和老百姓似乎头脑还好用,没有人蠢到将其归结于供需基本面的变化。

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后半期的通缩。当时流行的观点是,通缩是因为消费不旺,消费不旺的理由是贫富差距过大,因为穷人们虽然喜欢房子车子,但有心无力,富人们房事皆有,丝毫无再增加购买的欲望。当年房价跌人们怪富人,今天房价涨的也是富人。短几年,贫富差距的作用力完全导向了相反的方向。呜呼哀哉!

更近的例子是铁矿石。假设铁矿石价格预期稳定,那么钢厂可以按理论公式来保持最佳存货(比如20天),一旦上涨预期强烈,持有数倍于维持生产不中断的存货量(比如半年)也会很划算。甚至原本不知澳大利亚在何处的富人,也会对这种黑乎乎的东西下起大注。

这几个例子,想强调的是预期的重要性以及预期与囤积之间的关系。无疑,资产属性越强的东西这种关系越明显,很不幸,房子就具有这种属性。于是乎,那些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推算出35-45岁最适合购房的人,在上涨预期引导下,大大提前了购房时间。最近就有报道说,北京第一套房平均购房年龄为27岁。同样,那些本来可以晚些进行改善型购房的人,也是先下手为强。那些为牙牙学语的2岁幼儿准备好住房的父母,不也包含着类似的动机吗?

从1987年到1989年,中国火柴肥皂的生产能力和真实消费量几无变化,但需求却波动剧烈。同样,没有任何数据能证明城市化在最近几年加速了,也没有任何数据能证明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新增住房速度慢于人口增长速度,也没有证据显示中国人在这几年内比以往更热衷于结婚,更难发现丈母娘们与五年前的同类有什么不同。同样,贫富差距依然,但富人却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从背负“不买”的骂名,到成为“多买房”的罪魁祸首。然而,稍一反析,这只不过是同一个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的套套儿逻辑(tautology)。

对资产的需求取决于预期,上升的预期造成了“需求”,而需求又造成了更高的预期。在这样一个循环中,真实供求、刚需、富人等名词来作为否定收入房价比、房价租金比指标,作为否定泡沫的理由,犹如在6000元以上买入踊跃来论证股市无泡沫,以1600点买气低迷来论证中国经济无前景一样,是一种非常低级的同义反复。被这种套套儿逻辑牵着走,我们会被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正如1988年,就算你将全国的工厂都用来生产火柴肥皂食盐洗衣粉也解决不了问题,当今所有的调控如果不用解决预期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再多的疏通供求的措施也难逃失败的结局。

实话实说

防汽车产能过剩要多管齐下

谭浩俊

针对国内出现的新一轮“造车运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司长陈斌日前指出,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国内汽车企业的快速扩张加剧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坚决抑制。

汽车行业产能过剩,首先源于对汽车消费市场过度看好。我们承认,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中国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但这个市场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如果单纯用发达国家的衡量标准来预测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情况,一定会导致严重后果。近几年汽车消费需求的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两年来对汽车消费需求的刺激,已经出现了汽车消费脱离城市可容纳能力的现象。未来几年,绝不可能继续保持这样的消费需求。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对政绩的强烈渴求。众所周知,汽车业是一个投资大、产出高、带动性强的产业,这对于热衷于投资高强度、产出高水平、GDP快形成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为,一个汽车企业的落户带来的政绩,可以相当于无数个中小企业的总和,且影响力之大,也是中小企业所无法相比的。也正因为这样,地方政府可以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都给予这些汽车企业。至于会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那是未来的事、后任的事、国家的事。

对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未雨绸缪,早作部署,尽快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多管齐下,防止产能的进一步过剩。首先,进一步细化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制定全国统一的汽车产业短、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地方政府制定的汽车产业发展计划列入到全国统一的规划之中,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规模和数量,绝不允许地方和企业盲目扩大规模和数量。

第二,加强汽车市场消费需求的调研,客观、科学、准确地分析未来汽车市场的消费需求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各汽车生产企业下达控制指标,防止汽车生产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和数量。

第三,加大汽车产业投资控制力度,对盲目扩大投资计划、提高投资强度的企业,要通过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限制和处罚,特别对不符合国家汽车产业发展要求的企业,要严加控制和约束。

第四,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坚决杜绝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汽车项目而无偿给汽车企业优惠政策的行为,发展改革、国土、规划、环保等部门要严格审批程序,金融部门要严把信贷关,决不允许给汽车项目审批、供地、放贷等随意开“绿灯”。

第五,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凡是有自主品牌、创新品种的企业,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反之,则要严加控制。



财经漫画

婉拒劝捐

朱慧卿/图

直言不讳

让慈善晚宴激发中国人新财富观

毕 舸

今年8月4日,两位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宣布,已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本月底,盖茨与巴菲特将来到中国,与50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但这场以慈善为名的“晚宴”是否会进行劝捐?哪些中国富豪会应邀出席?令外界充满猜测和议论。

我们相信,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那些拥有亿万家产的富豪们,听到这个星球最有钱的人比尔·盖茨宣布退休并捐出全部财产这条消息,都会有所触动。当然,如果让中国富豪来效仿盖茨,那可能很难。人各有志,岂能勉强?

不过,作为一个人,很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跟盖茨的差别是什么?比尔·盖茨退休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在中国的传统理念中,我们为“再穷

不能穷子女”而艰苦奋斗;盖茨则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再富不能富子女”的洒脱和宽阔。

盖茨这一捐,展现了他对子女及自身财富的负责精神。金钱是一种财富,但金钱过多也会是一种负担。盖茨以前曾经多次说过,不会把自己的财富都留给子女,在他看来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是教他们以生存的能力而非金钱本身。580亿美元的财富海洋也许不会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很可能让他们“溺死”其中。另外,盖茨还认为给子女过多财富实际上是破坏了美国社会最基本的一条游戏规则:机会均等。他要让自己的孩子一开始就站在和别人同样的起跑线上,而他自己当年就是如此。

现代西方慈善文化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新教信仰,在基督教信仰里,富人只是代上帝管理财富的人。换句话说,在法律意义上,财富为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价值

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马克思·韦伯的不朽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的兴起是分不开的。按照新教理念,获取财富最大的意义在于完成上帝赋予人在这世上的使命,既然如此,将巨额财富传给儿女就是一种亵渎上帝荣耀、也损伤自身声誉和儿女长远竞争能力的行为。应该说,这是一种因为有了信仰的观照,而产生的更为健康、也更为崇高的财富观。

这显然和视血缘、家族为生命观念基石的中国文化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将财富传之子女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虽然传统文化中也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的劝导和晚清曾国藩似的不为儿孙积攒钱财的智者。但是,这样的行为从来没有在中国文化和历史长河中成为富人普遍的自觉选择。

进入现代,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

以后,在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下,虽然“大公无私”为社会主流话语所大力提倡,但社会现实却与之形成鲜明的反衬。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思潮更是普遍“向钱看”,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模式,在此之下,离这种健康崇高的财富观更为遥远了。

当然,除了信仰原因不同之外,在社会体制结构、慈善机制的设计和运作等方面,中国和西方社会也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正是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形成了当前很多中国富豪对于比尔·盖茨“裸捐”行为的不理解。特别是某些人,对此予以阴谋论式的理解和评断,这实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缺憾和精神贫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也许暂时还无法让中国富豪们像比尔·盖茨那样慷慨“裸捐”,但学习其更高层次的财富精神,也许是这场慈善晚宴送给所有中国人的最佳馈赠吧!